



沅陵龙兴讲寺。

刘科 摄

大道向前 我们这十年

湖南日报社、湖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、新湖南客户端主办

小河蝶变



潘文

每次去小河,我都兴奋。如今的小河,向人们展现的是一幅幅充满活力的乡村振兴新画卷。

小河是偏僻山区,我在那儿长大。十年前的小河,虽是世外桃源,但信息不通,交通不便,终究与外界隔绝。年轻一代读书、打工、外嫁,慢慢离开家乡,只留下老人和孩子的乡村变得格外清寂。小河乡的很多村,乌石、皇碑都曾是省级贫困村。

我喜欢山村田野。在城市生活的人,就像停靠在港口的船舶,表面繁荣而内心孤独。但在乡野,他们就像天上的鹰,看似孤独,实则自由洒脱。小河人也知道这样。他们爱家乡,不愿背井离乡,但终究要过上生活的柴米油盐,拗不过命运安排的生活轨迹。他们辗转于各城市,从一个街角到另一个街角,艰难创业。他们想回家,但又不行。他们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生活的困窘。

忽然有一天,亮锃锃的油砂路从高速路口一直钻到了山沟沟里,去往小河的车多起来了。扶贫干部来了,乡干部和村干部也在村里转着,苦思冥想。

在小河,最富有的就是美得让人窒息的原乡之景。村民守着山乡的秀雅和拙朴,自然与纯真,过着自给自足的惬意生活,日复一日。山村有山村的过法,但终究要跟上时代的步伐。更或许,还能找出更有特色和意义的活法呢?

于是,栽种百合、葵花,吸引城里人来乡村赏花;种植蔬果,让外面的人来体验采摘;打造红色旧址、活字印刷非遗馆、鱼鳞坝、云上小店、艺术街、星河天文台、清溪山房……这些年来,一个个旅游打卡地,如同璀璨的珍珠,在青山碧水间熠熠生辉。种粮,喂鸭和养山羊,培养画师……小河的农民手里有了实实在在的、足以支撑他们美好日子的能力和技术。

我们在青山绿水间行走,如画般的景致让人目不暇接。弯弯绕绕的油砂路时而进入郁郁葱葱的树林,时而又从山坡上窜了出来,游弋于宽阔的田垄间,偶尔它还要到清澈的溪河边溜达一会儿。我们跟随着它,任它弯来绕去。

沿路村民的庭院,也成了独特的风景。栋栋楼房美丽雅致,屋里屋外拾掇得干干净净。老人在院子里晒太阳,小孩追逐打闹,一切都安然闲适。在另一个村,我们被一户带小庭院的房子吸引着。房屋不大,土砖砌的墙,竹片围成的栅栏上爬满了牵牛花。栅栏围着的小院摆满了花花草草,玫红的三角梅在墙角开得热热闹闹。

新河村的村干部告诉我们,这是前几年才脱贫的王林家。这户人家十多年前还是一贫如洗,父亲生病在床,母亲有腿疾。几亩薄田难以养家糊口,高额的医药费总是让他捉襟见肘。山清水秀的家乡没有能够让王林过上安生的日子。后来,扶贫干部来了。他们给王林送来小鸭和养鸡技术。一片天的功夫,勤奋的王林打出了属于自己的几片天地。

对美好生活如此向往的,又何尝不是养鸭能手?小河乡的干部告诉我们,这十年来,小河的人们渐渐有了双艺术翅膀,他们也梦想着遨游艺术的殿堂。

小河有很多画室,有很多农民画师,早些年我便知道。在这十年里,小河乡整合产业扶贫资金,吸引文化商客,把农民画的项目引进来。画室,留住了很多外出打工的人——在家门口,他们就能有一份稳定当工的工作。这个画室,带动了42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。

刚开始,他们更多是把画画当成养家糊口的生计。但是几年来,很多画师把自己的心也投进去了。画画成了他们精神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,成了他们的寄托和生活的方向。

我们去的画室,在油砂路蜿蜒到森林深处的一个休息点。既是去画室,也是行于画廊之间。那些画师,正心无旁骛地泼墨挥毫。他们的眼里闪烁着光芒,那正是内心充盈的一种折射。



天下书院半湖湘

2. 弘道

除形式上奠定中国书院的规制之外,湖湘书院还在为谁培养人、培养什么人、怎样培养人这个核心方面,开全国之先河。

汉末以后,儒家思想逐渐失去了它的权威性和凝聚力,到了隋唐时期,佛教、道教盛行,价值观念处在散乱状态,整个社会需要新的思想体系来凝聚人心,形成共识。儒生们感叹,如果没有一个新的思想创造,整个社会会陷入万古长夜之中。率先播响鼓声的,便是湖南道县人周敦颐。

周敦颐和其弟子所开创新儒学,弥补了原始儒学缺乏内心慰藉、人生关怀和终极追问的缺陷,因强调道统和天理,人们习惯称之为“道学”或“理学”。自此,中国思想史进入了新的阶段。

当周敦颐的再传弟子胡安国踏进湖湘大地时,北宋已经变成了南宋。让胡安国痛心的是,“靖康之变”时,以科举和高官为目的的太学生,居然大多趋附于南下掠夺的金兵。

隐居于湖南的胡安国,在乱世的颠沛中苦苦寻觅能重新撑起人们信念与筋骨的精神力量。31年间,胡安国、胡宏父子开创了在全国影响巨大的“湖湘学派”,其沉淀的专务自强的精神品格,甚至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的发展道路。

在岳麓书院讲堂中的屏风中,至今镶嵌着张栻撰写的《岳麓书院记》,其中有一段话,凝结着张栻为书院奠定的教学宗旨:书院不仅仅是为了科举利禄和雕琢文辞,是要培养真正的人才,以传道济民。

张栻作为湖湘学派的集大成者,相比其他学派,更强调血性担当和经世致用,跟现实生活结合得更紧,也更加注重社会责任。张栻本人就根据北伐需要,让书院学子“晓畅军务”。他还与受邀而来的闽学代表朱熹在岳麓书院会见。这次被后世称为“朱张会讲”的会见,开创了不同派别之间进行学术对话的先河,也由此夯实了湖

湘文化“不困门户”“兼容并蓄”的精神基因。张栻常常以此勉励岳麓诸生,要成为真正有气节的国之栋梁,而不是趋炎附势之辈。书院,也从授业传道转向。

张栻逝世后,朱熹为书院制定了第一份学规,其中一句是“博学之,审问之,慎思之,明辨之,笃行之。”成为全国书院学子广为流传的为学修身之道。

朱熹认为书院教学的核心,是讲明“义理”以修身,然后推己及人,而不是为了“钓声名、取利禄”,与张栻“传道济民”的理念相呼应。这也成为岳麓书院始终坚守的传统,被后人称之为“朱张学统”。

“举止整齐严肃”“服食宜从俭素”“通晓时务物理”,这些朗朗上口的学规,提倡严肃的人生态度、勤俭的生活习惯,培养社会所需的“时务”人才,被学子们随时默诵,成为岳麓书院一以贯之的宝贵学风,既是张栻传道济民、经世致用教学精神的延续,也是人才勃发的内在源流。

在张栻的努力下,一个学术思想相近、影响巨大且勇于践行的理学群体形成了,他们被称为“岳麓诸儒”。在湖南已形成了潭州岳麓、衡州石鼓、道州濂溪、靖州鹤山等全国知名的理学中心。其中的靖州是少数民族同胞聚居区。公元1225年,宋末著名理学家魏了翁贬居于此,创立了当地最早的书院——鹤山书院。鹤山等书院,成为推动各民族同胞接受儒学教育、增进相互理解的重要载体。湖南人也更加清晰的文化自觉和精神特质,直面挑战。

公元1275年,当再一次面临国家危亡之时,岳麓等书院师生,这群从未拿过武器的儒生,顽强抵抗强悍元军达三月之久,大多牺牲。后人赞道:南轩先生(张栻)岳麓之教,身后不衰!从此,在国家危难之时,书生带兵、书生救国,成了湖湘地区引以为傲的文化传统。

4. 薪传

1901年9月14日,一道从朝廷发布的上谕,迅速传遍全国。

从这一天开始,全国书院将陆续改为大、中、小三级的新式学堂。这意味着延续一千多年的古老书院,将从此成为历史。

1910年秋,17岁的毛泽东离开韶山冲的家,前往五十里外的湘乡东山学校求学。此时的东山学校,因九年前的那场改制,而从传统的东山书院蜕变为远近闻名的新式学校,开办了算学、格致、方言、商务等课程。这让渴望新知的毛泽东,心向往之。

“公诚勤俭”,是东山学校的校训,这也成为毛泽东坚持一生的品格。大道之行,天下为公。1936年,毛泽东在陕北向美国记者斯诺介绍东山学校时说:“在这所新学堂里,我能够学到自然科学和西学的新学科”,后来他又感慨道:“我进不了东山学校,也到不了长沙城,只怕出不了韶山冲呢!”

在这位革命伟人心目中,东山学校,正是他迈向新世界的第一步。面对时代新风,书院并未被岁月所掩埋,而是带着千年沉积的厚重和底蕴,自我变革,重获新生。

在千年大变局的际会里,书院一次次参与到推动中国进步的历程中,成为酝酿和传播先进思想的沃土。

3. 绽放

清代对书院管理彻底官化,经费、师资都有了充足保证。省会书院、府级书院、县级书院,各级官办书院的山长都由各级行政长官礼聘,主政官员也常常按晚辈学生的礼节对待山长,以表明对书院的敬意。此时的湖湘书院,已经在全国乃至整个东亚、东南亚地区成为公认的榜样。

清初因为大兴“文字狱”等原因,学者们纷纷钻进故纸堆里,以考据为主的“汉学”兴盛起来,提倡论理学问皆有根据来源,而提倡“内圣外王”的“宋学”衰落下来。

在这个大背景下,到了清代中晚期,一直坚持兼容并蓄和经世致用传统的湖湘书院,迅速展现出卓然不群的姿态来。

在岳麓书院的正门,有一副全国闻名、充满豪气的对联:惟楚有材,于斯为盛!此联诞生于1812年,由山长袁名曜和魏源撰联。

那一年,魏源19岁。进入岳麓书院学习,是魏源人生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。受岳麓书院严谨治学、经世致用的学风影响,魏源从一介书生,开始成长为一位思想家、政治家。后来,受同样肄业于岳麓书院的贺长龄委托,魏源编选了一套收集清代以来关于政事、文政、刑律、经济、军事等领域实用文章的《皇朝经世文编》,开启了近代经世致用的思潮,那句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著名口号,更是湖湘书院经世理念的直接体现。

就在魏源入读岳麓书院的同一年,胡林翼、左宗棠出生,曾国藩刚满周岁。清代中兴四大名臣中,曾国藩、胡林翼受业于岳麓书院,左宗棠肄业于城南书院,

彭玉麟肄业于石鼓书院。这一群书生,全部成为了湘军的领袖,并在与大平军的对抗中赢得胜利后,开始从传统“内圣外王”转而为追求国家富强,创造了“晚清中兴”的局面,也开启了民族工业的大门。

经过陶澍、贺长龄、魏源等人的提倡,经过曾国藩、左宗棠、彭玉麟、胡林翼等人的弘扬,面对内忧外患,湖湘文化迸发出了惊人的力量,正如谭嗣同写道:“万物昭苏天地曙,要凭南岳一声雷。”现代著名史地学者谭其骧曾总结道:“清季以来,湖南人才辈出,功业之盛,举世无出其右。”

在岳麓书院挂出“惟楚有材、于斯为盛”对联的一百年后,陈独秀在1920年时写过一篇文章,名叫《欢迎湖南人底精神》。文章中说,明末清初的时候,王船山先生何等的艰苦奋斗的学者精神;在晚清的时候,近代的时候,曾国藩、罗泽南扎硬寨打死仗的何等的书生精神;辛亥革命时期的黄兴、蔡锷,那种知识型的军人的坚韧不拔的精神。他概括,所谓湖南人底精神就是奋斗精神,就是桥梁精神。当年王夫之、魏源、曾国藩这些,他们的事业是“造桥”。他认为,当时国家正又处于巨大的苦难之中,所以“欢迎湖南人底精神”,来造出更大更精美的桥。

从唐代杜甫的“首唱恢恢”,到清代“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”,经过书院熏陶的湖湘子弟们,迸发出拼尽全力也要为国家闯出一条血路来的血性担当,以及除“湖南人尽死”,也要拯救国家命运的赤诚信仰。湖湘书院不仅深度参与了中国思想变迁中的每一个关口,而且都发挥着重要的引领、推动和示范作用。



攸县石山书院。

蔡晓雅 摄

1. 生长

2014年,在攸县文化园中轴线北端,新建成了一座石山书院。石山书院与光石山书院一字之别,在萑苇的却是悠悠一千三百年。这虽然不是石山书院本来的模样,但基本涵盖了早期书院的功能布局。

隋唐时期,结束长期分裂战乱后,以科举制结束了士族垄断,整个社会焕发着渴望知识与人才迸发的勃勃朝气。以文弘教、以书聚人的书院随之兴起。当时的书院,以藏书为基础,以读书为主体,同时兼有切磋研究的功能。

安史之乱后,中原饱经战乱,文化名流纷纷踏进三湘大地。公元769年3月的一个清晨,经历安史之乱的杜甫,穿过烟波浩渺的洞庭湖,来到衡山县城。受邀参观当地书院后,颠沛乱世中安静读书的场景,让他心醉不已,写下“衡山虽小邑,首唱恢恢”的诗句。对这里引领风尚、弘扬大义,充满着期许。

书院之所长,称之为山长,源自唐代对山居讲学者的敬称。书院选址常以名山为首选。位于衡山西麓烟霞峰下的郭侯书院,因唐代名相李泌隐居而修建,开创了书院儒佛道交流对话的先河。郭侯书院的藏书均以“悬牙签”方式进行分类标注,并向大众开放。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公共图书馆之一,其图书分类方式沿用至今,“郭架”也成为藏书的别称。

不拘泥一派,不固守一端,成为湖南书院为这方水土奠定的精神文脉,也为中华文化注入了广纳开放和自我调适的风范。

据统计,唐代书院约49所,而当时文化相对落后的湖南就有8所,占全国的六分之一,成为全国文教胜地。

湘江西岸,临橘子洲头,长沙岳麓书院,掩映在一片青翠中。北宋开宝九年,公元976年。潭州知州朱洞,在五代二僧办学的基础上,创立了岳麓书院。二十年后,潭州知州李允则希望能解决书院因人而起、因人而废的困境,决定在教学、藏书、祭祀三大基本功能之外,创造性地增加了学田。让田租源源不绝地为书院提供办学、维修的经费。岳麓书院开创的四大规制,已经类似现代大学的教学楼、宿舍、礼堂、图书馆、校史馆和基金会等,成为全国书院争相模仿的范式。

北宋大中祥符八年,公元1015年,宋真宗召见岳麓书院山长周式,御笔赐书“岳麓书院”匾额。此时的湖湘书院,也迎来了大爆发。

宋代以文治国,强化科举取士,但其早期只有百分之五左右的州县设置了官学,远远不能满足读书人的需求。所以官方把这个已经有了教育教学功能的书院,抓了几个典型进行表彰。

风尚之下,野火燎原。湖湘的大族宗亲、乡士绅以及主政官员纷纷力倡文教、兴建书院。衡山赵抃书院、永兴湖南书院、湘阴筍竹书院等一批书院,如雨后春笋般,密集地生长在湖湘大地上。

滕飞

书香氤氲,院中春秋。书院,历经1300年的发展,到清代末年,遍布除西藏以外的全国所有省区,是我国古代思想研究创造、文化传播普及最广泛和最重要的机构。

公元718年,唐玄宗创立丽正书院,以整理内府典籍,这是书院首次出现在官方记载中。而位于湖南攸县境内的光石山书院,却是有据可查的中国最早的书院,且早于丽正。

湖南书院发展之早、名声之大、数量之多、普及之广,学术、人才之盛,居各朝前列,为士林所公认。宋代四大书院中,湖南的岳麓书院、石鼓书院均位列其中。天下名院,半属湖湘,湖南书院不仅以历史上共有531所的数量高居全国前列,还形成“学术源流之胜,未有出湖湘之右”的学术成就,不断开全国风气之先、引时代际变之烈,其积淀的精神品格,润泽湖湘,激荡华夏。

在漫长的岁月里,湖湘书院承载着延绵不绝的精神要义和文化根脉,穿越千年,烛照未来。